

我心目中的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

孙 贵范 第 1 期笹川生

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教授

我坐在由沈阳开往北京的 D4 快速动车上,当时速牌上显示列车已达到 250 公里/小时,我似乎有一种 20 年前在日本留学时由东京去大阪乘坐新干线上的感觉。内心里一边感受着中国的发展速度,一边不由自主地在各方面将中国和日本进行着比较。这种比较自我留学归国后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这一切源于 20 多年前在我的一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上的国外留学生活。

1987 年,中国还处在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与质量和今天不能相比,但温饱问题在中国大地上基本得到解决。农民有了自己的一块土地可自由耕耘。城里的人都有一份固定的工作,每月有可靠的工资来源,而且彼此之间差距都不大。大学生以国家资助为主读大学而且毕业国家包管分配。这种改革带来的变化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包括我们这些大学老师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深刻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那时,大多数人不知道国外尤其发达国家的状况,出国留学还仅仅处在国家公费派出,没有私费留学,对任何一个出国人员的政治审查还是很严格的,而每一个出国留学的人去哪里留学不是自己选择而是根据国家需要派出,而和你学习的外语语种没多大关系。可想而知,在当时能够被选中出国留学是很幸运和骄傲的。我就是在这一年通过了外语考试和政治审查合格后被卫生部选中,获得笹川医学奖学金资助,到日本筑波大学留学,尽管我是学英语出身的。

当时对笹川医学奖学金只是理解为提供我们的留学经费,对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尚不了解。但当你身居其中作为这个制度的实践者和受益者并全部经历了这一留学过程后,尤其对我这个第一期笹川生又是第一期特别研究员,其后因工作需要,我本人又担当了 15 年笹川生同学会理事长的经历,纵观了这一制度前后 20 年的实施过程,使我能够站在一个笹川生的角度和层面,深刻理解该项奖学金制度的精髓、深远影响和伟大的精神。

我们归国笹川生在同学会聚会或有机会在一起聊起我们的奖学金制度时,大家都会对这一制度谈及很多感想和体会并予以热烈评价和提出期待,也为自己能成为一名笹川生而感到自豪。不仅我们笹川生本身,凡是知道这一奖学金制度的人,从领导到我们周围的同事都对该制度予以非常高的评价。

首先,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在单一学科领域实施资助时间之长、被资助者遍布全国各省市地域之广、培养人才数量之多在中国尚属前所未有的。而且,受资助的笹川生涉及到医药领域中所有专业,在日本选择的导师和学校、研究单位几乎遍及日本全国。根据截至 2007 年底的统计,该制度培养的近 2000 名笹川生,遍及包括西藏、新疆、内蒙、海南等偏远省区在内的中国大陆的所有省和自治区。笹川生的专业涉及了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法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护理学和药理学、药剂学、中药学等医

药所有专业领域。从规模、时间跨度、培养人才数量可与世界上的任何奖学金制度相媲美。

第二，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人性化程度似乎没有哪个奖学金制度可比。每个笹川生都有相同的感受。从语言培训到集体出发，从抵达时的热情招待到整个学习过程的全面关照，从留学中期的香根聚会到集体护送归国，我们称之为“幼儿园式关照”。其实，对我们每个笹川生来说，人生地不熟，语言不过关，特别是第一次到国外，这种关照是最使人感到亲切、实用和人性化的。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我们期一位同学在开始学习过程中，因语言问题和两国文化间的差异，他和教研室的日本同事们发生了麻烦，情绪极其低落和郁闷，当时日中医学协会的阿部先生知道此事后迅速到该研究室和导师沟通，及时解决了问题，使得该同学得以顺利完成学习任务。在他谈及阿部先生的耐心和细致的工作时，我们听到的人无不为之感动。记得香根聚会时，接近半年时间，我们每个人都因独自在各自的研究室里学习工作，绝大多数人周围没有中国人，在开始的几个月语言又不过关，每个人遇到的孤独、寂寞和思乡情结是可想而知的，我们通常称之“出国综合症”。而正在这时，财团组织全体笹川生在箱根聚会，同学们之兴奋、放松和激动之情只有我们这些笹川生才能感悟。大家谈心、歌唱，有的几乎成宿不眠。在我们第二天聚会时，我始终难以忘记的是笹川阳平先生问好之后的第一句话是：“奖学金给大家的钱是否够花，不够花的请举手”。阳平先生的开场白一下子把大家的孤独感驱散，把我们和关照我们的财团及日中医学协会的朋友们的感情拉近。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应该说日中医学协会和财团事务局的朋友们以人性化工作方式，在具体落实该项制度上不断创新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第三，建立归国笹川生同学会，为促进归国笹川生之间、笹川生与导师之间、笹川生与财团和日中医学协会朋友们之间的联系和该奖学金制度精神的永续发扬光大创建了一个载体。我作为同学会的前任理事长对此是最有体会的。应该说，像我们笹川生这样在归国后由财团资助建立起自己的同学会，除了同学会自办笹川生通讯交流我们的信息外，每年都要组织归国的笹川生和日本导师代表、财团和日中医学协会的朋友及中国卫生部的领导聚会，进行学术交流，汇报我们归国笹川生的工作以及举行联欢会，这在许多类似的同学会中是很罕见的。与此同时，同学会组织的由归国笹川生构建的医疗队每年都到我国贫困地区、受灾地区进行义诊，受到各地区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真挚的感谢，不仅使我们笹川生感受到归国后能为贫困地区人民服务尽了力，更重要的是增进了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当老百姓知道了笹川生和笹川医学奖学金是怎么回事后，都对笹川财团慷慨援助和为我国培养人才之义举表示赞赏和感谢。在财团的赞助下，同学会还建立了资助归国笹川生科学研究专项启动基金，钱虽不多，但为刚刚归国尚无科研基金的优秀年轻笹川生如同雪中送炭，并为后续获得国家科研资助真正发挥了启动作用。由同学会作为载体开展的这些活动，为笹川生归国后能够继续在这一制度下进行交流和沟通，为和日本导师及财团和日中医学协会的朋友们保持联系，使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的精神发扬光大是其他任何载体难以做到的。

春天播种，秋天收获，精心耕耘，喜获硕果。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在中国卫生部、日本财团、笹川纪念保健协力财团及日中医学协会相关领导的热诚关心和大力支持下得以顺利实

施和不断创新，由该奖学金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才在促进中国医疗卫生的发展和为国人服务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据我国卫生部统计，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送出培养的人才按期归国服务率是最高的，学成归国的 2000 多笹川生均在全国医药卫生第一线发挥着骨干作用。绝大多数笹川生归国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取得突出成绩，有相当比例的笹川生已成为各级医药卫生单位的专家和学术及学科带头人。在国家发生重大灾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救助中，如 2003 年抗击 SARS 流行，2008 年四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等，都有归国笹川生的参加和受到嘉奖。一些优秀的笹川生还被各级医药卫生部门提升为院系主任、医院和学院院长以致大学校长和卫生厅局长的领导岗位。而且有两位归国笹川生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对我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来说，受笹川医学奖学金资助赴日留学，是我人生中的重要里程碑转变。赴日留学是我的第一次出国，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的年代，看到国外的发展和科技进步，第一次感觉到我们的国家落后了，深刻认识到国家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国家才能强盛，人民生活才能得到改善。我想，所有笹川生，特别是 2000 年以前赴日的笹川生是更有感触的。那时，从我们在日本进修的实验室装备到实验技术，从生活上的物质条件，包括住房、家用电器、电话、衣食住行，国内根本无法和日本相比，更难想象未来能有一套舒适的住房和小汽车。记得我陪我的朋友下条先生在 1988 年冬来访沈阳，当时在太原街中兴商业大厦去买一件羽绒服，在一楼大厅的滚梯入口处积满了人群，特别是孩子。他问我为什么，我说这是这座商场第一次安装滚梯，许多人好奇都是第一次乘坐。这就是历史，就是我们当时的现状。因此，对我们那时出国的人来说，对国外快速发展的感受，对国家必须加速发展的期盼远远强于学习技术本身。当时我本人下决心除进修业务外，要学好日语，融于这个民族并了解他们的奋斗史，学习他们的勤奋刻苦精神，要广交朋友，把我本次留学日本的成果发扬光大。20 年来，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我交了许多日本朋友。从我 1988 年归国到现在，我和日本朋友的关系从来没断，我和筑波大学、东海大学、圣玛利亚医科大学、大阪医科大学、金泽大学、旭川医科大学、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等开展了多项科研合作，我先后送出 7 名研究生赴日留学。我本人归国后，在学术上也取得一定的进步，先后承担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和国家科技攻关课题在内的各类课题十多项，获得了许多荣誉称号，并多年担任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这一切与我的赴日留学分不开的。我感谢笹川医学奖学金对我的资助，我珍惜赴日留学的经历和从日本民族学到的勤奋敬业精神。我作为担当 15 年的笹川生同学会理事长，感谢财团和日中医学协会的朋友们，特别是笹川阳平先生对同学会矢志不渝的支持和鼓励。我希望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进一步完善，其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